



## “四人帮” 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

之四：



■ 霞 飞

### 出生在船工之家

陈阿大原籍并非上海，而在浙江省的绍兴县陶南乡。绍兴那个地方多产鱼，因此，当地靠打鱼为生的人很多，陈阿大的祖父陈阿澳、父亲陈七二都是当地的渔民。陈七二不仅打鱼，还用船运送货物，但家里日子过得仍然不好。后来，绍兴至上海通了快班船，需要船工。当船工，收入稍微多一些，但常年往来于绍兴至上海之间，生活不安定，也十分辛苦，没有多少人愿意长期干。陈七二为生活所迫，就去当了船工，而且一干就是十年。他每次出船，一去就是几天，回来后往往歇息不多久，就又要出船。他的妻子则留在绍兴家中操持家务。

1942年5月，陈七二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在绍兴，由于是第一个孩子，陈七二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陈阿大。由于陈阿大的祖父是渔民，父亲靠撑船生活，后来当上了绍兴至上海的船工，陈阿大就算是出生在船工之家了。陈阿大的这个家庭出身，使他十分骄傲。他曾经多次说自己是贫苦家庭出身，“根红苗正”，因此对共产党、毛主席十分忠心。他也靠这一条，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无忌惮地冲冲杀杀。当然，这是后话。

### 绍兴乡下的童年

陈阿大从小就很少见到父亲的面，因为他父亲常年在绍兴至上海之间跑船，对子女照顾不过来，就把陈阿大寄养在妻子乡下的娘家。陈七二当船工，

脱不开身，一年中，到岳父母家中的次数有限，以至陈阿大到六七岁时，对父亲的印象仍然十分模糊。陈阿大是跟着他的外婆长大的。外婆家也很穷，经常有吃不饱的日子，但外婆对陈阿大很疼爱，宁可自己少吃，也要给陈阿大吃。这样，陈阿大虽然也经常有吃不饱的时候，总算没有挨多少饿，并且在外婆的呵护下逐渐长大。到了四五岁，能在外面跑了，陈阿大就和乡下的孩子们一起打鸟、摸鱼、爬树，到河里去游水。陈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家里穷，没有钱供他念书，因此，陈阿大没有上学，他和绍兴乡下的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整天在乡间跑来跑去，尽情地游玩，倒也炼出了结实的身体。

在乡下的孩子中，陈阿大是胆子最大的一个。上比较高的树，他第一个敢上，下较深的水中游泳，他第一个跳下去。而在摸鱼方面，他更是高出伙伴们一手，每次和伙伴们出去摸鱼，他都是摸得最多的一个。

陈阿大在绍兴乡下的童年，虽然吃得很不好，穿得也很破烂，还经常见不到父亲的面，但他也是欢乐的，无忧无虑的，他整天和乡下的伙伴在一起玩，很开心。

### 到上海读书

陈阿大六七岁时，他的父亲陈七二考虑：这样常年跑船，十分辛苦，得到的收入也难以养家，心思便活动起来。

今天40岁左右的上海人还都听说过陈阿大这个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爬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领导人的位置，还当上了九大和十大代表。但曾几何时，他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销声匿迹，在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踪影。那么，陈阿大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呢？

他经常去上海，见在上海做零工很赚钱，就放弃了船工的工作，在上海干零工，主要是给人家干一些搬运货物的活计，晚上就临时住在工棚里。在上海打这种零工，收入多一点，但很不稳定。陈七二发现上海人很爱吃绍兴乡下的菜，就在活少的时候，跑回绍兴乡下低价收购一些萝卜干，用船运到上海来卖，每次能赚一些钱，使家里的穷日子能够过下去。

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对像陈七二这种干零工的工人也十分重视，认为他们是苦出身，在大城市做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重新安排。陈七二被人民政府安排到他经常搬运货物的上海一家造船厂（后称上海中华造船厂），当上了一名正式的搬运工。中华造船厂对工人的生活问题十分重视，特别是对像陈七二这样从乡下来干零工的人，更是十分关心。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因此，给他们定的伙食标准也高于其他工种，还逐步在上海给他们安排住房，以便他们能把家属接到上海来一起生活。1952年，厂方在上海南市聚奎街给陈七二安排了一处住房，虽然不大，但总算在上海安了家。陈七二便把老婆孩子接到上海来了。这



一年,陈阿大十岁,是第一次来上海。一个从乡下刚到上海的孩子,自然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

那时上海市十分注重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陈阿大已经十岁,还没有上过学,因此,他刚到上海,就得到政府的关心,让他进入小学读书,并且免去了他的很大一部分学杂费。

刚刚入小学的陈阿大,还是认真对待学习的。他每天认真听课,用功做作业,跟上了小学的课程。他从不识字开始起步,很快就达到了能够看简单的书信的程度。后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还算好。由于家里经济不宽裕,那时的陈阿大,穿的是用他父亲穿旧的工装改成的破衣服,鞋子是用乡下的土布做的,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是寒酸了一些。但陈阿大从不在乎这些,也不和别人攀比,而是一心读书。那个时候,他的交往圈子很小,他的绍兴乡下口音,曾经是同学们的取笑材料。感到有些孤独的他,说话不多,只知道用功学习。由于下了一些功夫,他不但只用了四年时间便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很顺利地毕业了,还考上了初中。

#### 从搬运工到钳工

正当陈阿大进入初中用功读书、和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做着将来当工程师或者科学家的梦时,他家里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他的命运的事情——他的父亲被罚款了。

原来,他父亲当上上海中华造船厂的搬运工后,虽然收入不算少,但他的妻子章桂花没有工作,子女又多,家庭经济一直不宽余。为了使家庭收入更多一点,他又干起了他在旧社会就做的倒卖萝卜干的事情。每到休息日,他就从上海回到绍兴老家,买一些萝卜干,用船运到上海来卖给一些商铺,赚一些钱补贴家庭生活。陈七二搞来搞去,就想动点脑筋,多赚点钱。他的办法,就是在萝卜干中掺点水,增加重量,再卖出去。一次,他赚钱心切,一下子在萝卜干中多掺了水,结果被收买方发现了,再一检查仓库中从陈七二手中买来的萝卜干,发现许多都变了质。收买方大怒,向政府方面报告后,罚了陈七二的款且不说,原来的库存,也不给陈七二结款了。造船厂也警告陈七二,再也不允许他利用业余时间去干倒卖萝卜干的事情了。这样一来,陈七二业余赚钱的门路断了,还被罚了

款,家庭经济情况一下子变得很糟糕。陈七二再也拿不出钱来让孩子读书了,他让正上初中一年级的陈阿大和正上小学的陈阿二双双退学回家。陈阿大不得不从自己的工程师的梦中醒来,中断了自己的学生生活,背着书包回了家。他的心中难免带有几分酸楚。

回到家中,陈阿大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读书了,因此,他不再摸书本,又没有什么可干的,在家里也呆不住,就和弟弟跑出去玩。时间一长,就和街道上的流氓、阿飞混在了一起。他们整天在街上闲逛,打打闹闹,自然也就沾染上了一些流氓习气。他父亲在厂里上班,没有时间管他,他母亲管不住他,他成了自由自在的人。

有一次,陈阿大和陈阿二在外面和别人打了架,人家找上家门来,他父亲给人家赔了许多不是,来人才算是罢休。这件事使陈七二意识到:再也不能让陈阿大和陈阿二在街道上闲逛了,要让他们工作,一方面,在单位有个管束,另一方面,兄弟二人工作,也能有一些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情况。但陈阿二年纪还小,只好让15岁的陈阿大去工作。1957年,陈七二托自己的老朋友在上海南码头给陈阿大找了一份临时工干。陈阿大很高兴。这个临时工,也是搞搬运的。陈阿大虽然只有15岁,但也要干一个成年劳动力的活,每天是够劳累的,但一想到能够挣钱给家里,陈阿大就坚持了下来。经过这段时间做搬运工的劳动锻炼,陈阿大的体格逐渐强壮起来。

但是,总做临时工也不是个事,在陈阿大做临时工的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陈七二就想把家庭的困难向自己的单位提出。那时,工人有事就找单位解决,单位也认真对待。陈七二便找到自己所在的造船厂,向组织上提出了让他两个儿子到厂里来工作的请求。造船厂早已经关注陈七二一家的情况,也在想办法帮助他一家。当时中国处于大跃进时期,厂里正缺少工人,造船厂方面经过仔细考虑后,就同意了。

1958年的一天,陈阿大和陈阿二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了中华造船厂的大门。组织上和兄弟二人谈了话,让他们好好干,向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学习,又给他们办好了入厂手续。当兄弟二人走出造船厂大门时,他们已经穿上了厂里的工作服装。

陈阿大进入造船厂后,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又在南码头做过搬运工,厂方就安排他当搬运工。陈阿大参加了工作,心里是十分高兴的,他对这份工作也很热爱,在工作中是积极努力的。虽然只有16岁,但陈阿大已经长成了壮小伙。体力上已经不比别人差了,加上他又舍不得出力气,因此,他总是超额完成工作量。在和工人朝夕相处中,他也学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比如:陈阿大生活朴素。这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出身在贫穷人家,从小就艰苦惯了,更主要的是他生活在一群朴素的工人中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平时就穿厂里发的工作服,在厂里食堂也是只吃最便宜的饭菜,平时用牙膏、香皂,都很注意节约。每月发的工资,他都全部交给家里。现在从档案看到的当年中华造船厂给陈阿大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这个鉴定材料说明,陈阿大那时表现还是好的。那时的陈阿大,心情是好的,他兄弟二人都参加了工作,都能挣钱了,他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快就好转起来。他父亲和母亲也有了笑脸。他本人是一名工人,在社会上也了一定的地位。从这一点,他感谢共产党,在工作中也十分努力。

由于陈阿大在厂里表现好,工作积极上进,组织上就注意对他的培养。当时厂里缺少技术工人,考虑到陈阿大的情况,在他入厂一年半后,就决定让他跟着一个钳工学技术。陈阿大学钳工,很注意钻研,也很虚心,很快就学会了钳工技术,并且能够自己独立工作了。这样,他在造船厂就从搬运工变成了钳工。

#### 在部队干过三样工作

1961年夏季,部队在上海征兵,造船厂也号召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陈阿大也想去参军,回去和父母商量,父母觉得家里经济情况也可以了,就同意了。7月,陈阿大在造船厂报了名,当月体检,陈阿大各项指标都合格,8月,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陈阿大脱下了造船厂的工装,高高兴兴地换上了军装,告别了父母和工友,和一同参军的同伴们迈进了军营,成为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的一名战士。这一年,陈阿大19岁。

和当时大多数入伍青年一样,陈阿大也想在部队穿着军装,拿着枪,有一副十分威武的样子。但让他没有想到的



是，入伍后，部队上却分配他去教导营当一名饲养员，任务就是养猪。这让他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那个时代，是人人争先恐后、追求进步的时代，他自然也受时代风气影响，干一行爱一行，安心在饲养员的岗位上干，而且干得很好。那时部队养猪，很大的难题是找猪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猪饲料也很缺乏，他就到野外去打猪草来喂猪。他负责养的猪，膘肥体壮，为连队发展副业生产和改善伙食，做出了一定贡献。

部队上鉴于他表现好，又让他去当连队的炊事员。在这个岗位上，陈阿大也很努力，他经常当最早起的班，为上百人做好饭，最后自己才吃饭。他还想方设法为连队改善伙食，受到过连长的表扬。他当饲养员半年，当炊事员半年，总的表现是不错的。入伍一年后，部队给他升为上等兵，又让他当高炮指挥仪测手。他学习这方面技能，也很用心，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测手。在训练中，他一直表现得很积极。在军事演习中，他们一组士兵曾经取得较好成绩。在他退役之前，部队将他升为上士军衔。现在能够看到的陈阿大过去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 进入上海良工阀门厂

1965年春，陈阿大从军队复员回到上海。按当年的政策，从上海正式工人当兵回来的复员军人，组织上要统一安排。考虑到陈阿大在部队表现很好，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工作，还是当工人。他又操起了钳工旧业。良工阀门厂对陈阿大还是十分重视的，原来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和民兵排长调到其他车间去了，组织上就让他车间里兼任这两个职务。陈阿大做这两项兼职也很负责，每天干完活，下班之前，他都要检查一遍车间安全情况。他当民兵排长，和车间里的年轻人也混得很熟。工余时间，和这些年轻人一起打球、下棋，锻炼身体。

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年的社教，是很讲阶级性的。陈阿大出生在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他仍然受到

了重视。“四清”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他也参加了一些查账目等工作。但他毕竟文化程度不高，更核心的工作、更细致的事情，他做不来。在“四清”中，他能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陈阿大为人大大咧咧，和年轻人交往密切，有一定的人缘，他利用这个条件，了解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向工作队汇报，能使工作队对群众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由于他到厂后表现较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此时，他还不到24岁，组织上准备进一步培养他。

#### 造反头目

本来，陈阿大进入良工阀门厂后，对厂领导还是很尊重的，厂里也注意培养他，让他参加“四清”工作，吸收他入了团。但陈阿大在参加“四清”工作中，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也对厂里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厂领导有些事情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也是他后来造厂领导的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鸡毛蒜皮的意见，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了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陈阿大敢做敢闯，了解到的厂领导的“问题”多，敢于揭发，也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不久，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他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不久，由他倡议，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造反兵团人数不断增多。陈阿大也就成了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 紧跟王洪文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

企业造反组织——“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这个造反组织的发起者。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并建立了“小兄弟”的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非常佩服王洪文胆量大，敢冒险，非常佩服王洪文有政治眼光，能抓住政治动向，做出决策，也非常佩服王洪文有组织能力，会拢络人心。而他本人，实际上就是被王洪文拢络的一个。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作自己手下一员虎将，后来，王洪文做了高官后，还不断提拔陈阿大，让陈阿大也做上了高官。这是后话。

#### “武斗猛将”

由于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就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在1966年11月上旬，王洪文制造了安亭事件，指挥造反派卧轨拦车，说是要去北京告状。在这次事件中，陈阿大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率领他手下的几名造反骨干，爬上了他们拦住的第一趟列车，高呼口号，一路向北京进发，无论是谁，也劝阻不住。直到南京，列车不往前开了，他们才下车。

1966年11月底，王洪文一手制造《解放日报》事件。当时，“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造反组织在《解放日报》社严重对立，一场大的武斗一触即发。这时，陈阿大打了一个电话，一下子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几千名造反队员，把《解放日报》社中的“赤卫队”队员团团包围起来，并迫使《解放日报》领导让步，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开列的条件，并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在这件事中，王洪文对陈阿大赞赏有加，多次说，陈阿大在《解放日报》这件事情上有大功。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十万人，把“赤卫队”三万多人围在康平路。12月30日，“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总攻。陈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号，带头冲向“赤卫队”，



见人就打，几个人抓一个。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赤卫队”的主力歼灭。陈阿大指挥着手下的造反队员，押着“俘虏”，在马路集中，陈阿大洋洋得意地训话，还要“赤卫队”队员们把袖标摘下来，集中了六大堆，然后，由陈阿大下令烧毁。陈阿大还把缴获的“赤卫队”的几百箱饼干，如数上交，以表现自己的“清廉”。陈阿大在这次事件中，冲锋在前，又一次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挥二十四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柴油机厂的造反组织——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又调来灭火用的高压水枪，向“联司”喷射。他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 掌权有术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也不亏待陈阿大。1967年1月他们建立所谓“上海人民公社”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当年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人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他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念。有的稿子，他干脆让秘书和主办会议的单位商量，由主办单位先拿出稿子来，由他的秘书修改，抄清后，他在会上念。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做法，他还主观地说：中央领导人也是这样。

当他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真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后，总要

作指示。他的指示，就是几条，他怕话说多了，出漏洞。发表这些指示后，他要求他的秘书记下来，也要求下边的单位记下来。回去后，过几天，他就让秘书打电话问落实情况。如果基层单位忘记了他的指示，或者没有完全按他的指示办，他就会直接打电话，找那个单位领导人，先让他背诵自己去检查工作时的指示，然后再训那个单位的领导人。如果连他的指示都背不下来，他就让这位领导人“靠边站”。

陈阿大自认为有察言观色的本领，因此，他下去检查、听汇报时，有一个习惯，就是盯着汇报人看，如果对方说假话，他看出来后，立即打断汇报，派手下的人去另外调查了解情况。开汇报会时，汇报的人不止一个，每个人发言，他就把头转向这个人，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这个人。当桌子上有热水瓶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时，他会让秘书把热水瓶拿开。陈阿大眼睛盯着汇报人，往往使汇报人不知所措。此时，陈阿大就会突然问一些尖刻的问题，把对方问住，他用这种方法，树立自己的“权威”。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一级领导人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他的兼职，可不是虚的，这个厂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向他汇报。都要听他的指示。厂里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车间主任一级的干部，都要经过他同意才能任命。厂里的要害部门，如政工、财务、保卫等，连一般干部也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当。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他的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惟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也可以一呼百应。

在“文革”初期，也有一些反对陈阿大的组织和个人，陈阿大对付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打”，而且手段有时十分残忍。陈阿大为了对付反对自己的人，在他的老窝——良工阀门厂专门组织他手下的亲信，成立了一个“良工阀门厂专政队”。他们打着旗号是维护治安，打击流氓，但实际上是专门对反对陈阿大的人实施打击的组织。凡是反对陈阿大的人，都要被这个组织抓起来，关在一

间小黑屋子里，施以酷刑。在陈阿大的指挥下，他们对抓起来的人施行许多刑罚，什么“倒着爬”、“打大板”、“吃耳光”、“挨皮鞭”等等，名目繁多。他们还硬拖着被关押的人在煤渣路上翻跟头，让他们光着脚在煤渣路上跑，用膝盖在煤渣路上爬。不爬，就用皮鞭抽打。他们边用皮鞭抽打，边让被打者数数，如果数错了，就要重新抽打。他们还让被关押的人互相对打，谁如果打轻了，就要对这个人施以酷刑。陈阿大自己不动手打，他也不到现场，但他遥控着这些。为了解现场真实情况，陈阿大还让手下把打人的情况用录音机记录下来，放给他听，陈阿大觉得听着这些被打者的惨叫声，是一种享受。为了让被打者的家属也受到刺激，陈阿大还让手下的人把这些录音放给他们家属听，逼着家属做被打者工作，让他们“老实交待罪行”。

#### 突击入党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起来，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安排自己的秘书和陈阿大谈话，暗示他写入党申请书，可陈阿大竟然没有听明白。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了，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是，又不好明说让陈阿大写入党申请书。陈阿大却以为，自己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没有想到写入党申请书的事，他也不知道入党还需要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内心十分焦急。他们急忙找一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聊一聊。不料这位常委找陈阿大聊时，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也不懂入党要先写申请书这个事情，只是瞪着眼睛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了吧。最后，这位常委没有办法，干脆点明：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陈阿大回去后立即动笔，可是，他不会写，写个草稿也有不少错字，只好让秘书代



笔修改后，他自己重新抄清楚，交了上去。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张春桥、姚文元立即调阅了陈阿大这份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这个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入党问题。当天，该厂的金工车间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入党问题。会上，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先后发言，介绍了陈阿大怎么出身贫苦，怎么从小当工人，怎么当过兵，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等等。接着，由党员发言评论。事先，王秀珍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有人发言，歌颂陈阿大的功劳。从目前我们看到的陈阿大入党的会议发言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为陈阿大评功摆好，达到了肉麻的程度。这个说：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那个说：陈阿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先锋、当闯将，担任“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工交组负责人后，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还有人说：陈阿大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典型。在这些人发言之后，王秀珍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在会上也发言，把陈阿大吹捧了一番。她说：我和陈阿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陈阿大阶级斗争觉悟高，勇挑革命重担，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接在王秀珍之后发言，称赞陈阿大有水平，觉悟高。他还一连说了陈阿大十个好。会上决定，发展陈阿大入党。按当时规定，通过之日，陈阿大就是正式党员。陈阿大从写入党申请书，到正式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说他是突击入党，一点也不过分。

陈阿大入党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确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

了，陈阿大是在已经当上了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的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清了两份。

####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锋

陈阿大参加九大后，他的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市工交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要高多了。他已经是正式党员且不说，他又是出席九大的代表。这在当年是相当重要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因为有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才把陈阿大列入应该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之列。此后，上海政坛上出现了一位“新星”——陈阿大。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有陈阿大出面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会必到，到会后必讲话。他在内心里，是十分珍惜抛头露面的机会的。

陈阿大在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他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今天，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王洪文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过去上海人都知道，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1976年，周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主席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就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企业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



受审时的陈阿大。

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必要的时候，就打巷战。他还参与制订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民兵作战方案。陈阿大在向民兵讲话时，公然宣称：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陈阿大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将来王洪文可能会登上中央主席的位置，他们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死党们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召开了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决定调动3500个民兵集中，31000个民兵待命。此时的陈阿大，跳得最欢。他又是跑到民兵指挥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讲话、搞动员，又是布置突击发枪，又是检查电台安装情况。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之召，陈阿大和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我们上海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条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上海。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陈阿大紧跟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动乱，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帮”覆灭之际策划搞武装叛乱，最终避免不了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抓之后，华国锋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海市委。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来陈阿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大浪淘沙。陈阿大出身贫苦，青年时，算是个上进青年，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王洪文，逆历史潮流而动，干了不少坏事，最终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 “四人帮” 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

## 之五：

# 黄金海

■ 霞 飞

### 工人出身

黄金海祖籍并不是上海，而是江苏镇江。清末，上海开埠，临近上海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的大批经商者、失地农民等流入上海。黄家也是那个时候流入上海的（一说是30年代流入上海的——笔者注）。黄家流入上海后，没有发过大财，世代为下层劳动者。黄金海的父亲，也是做工出身。黄家一家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生活，仅靠做工为生，其家境可想而知，是很贫穷的。

1935年，黄金海就出生在上海这样一个靠做工为生的家庭中。由于经常挨饿，黄金海小时候即患上了胃病。黄金海懂事时，即目睹社会的不平等，产生了对旧制度的仇恨感。家庭的贫苦，迫使他从小就懂得帮助家里干些零活，养成了能吃苦耐劳的习惯。黄金海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但终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这种情况，对于当时上海大多数贫苦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司空见惯的。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特别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下一代，采取各种办法，让工人子弟读书。当时，黄金海已经14岁了。由于文化基础差，他只能从小学读起，很快就进中学。这种快速学习的方式，不可能使他有更好的知识积累，但也比那些老区的“扫盲班”、“识字班”出来的人要强

得多。因此，说黄金海有中学学历，也算合乎情理。黄金海在小学和中学各读了一段时间，正赶上50年代上海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特别是要在上海发展早就有棉纺织生产传统的轻工业生产，需要扩大招收青年工人。因此，50年代初，刚刚十六七岁的黄金海进入一家棉纺厂当上了工人。因此可以说，黄金海是正宗产业工人出身。

公私合营后，上海的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规模，工人也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到50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国营棉纺织厂，黄金海所在的棉纺织厂，成为国营第三十一厂，简称为国棉三十一厂。这个工厂处在上海杨树浦长阳路上，比王洪文当年所在的上海国棉十七厂要大，职工有一万多人，在上海轻工业部门中，算是比较大的工厂了。在这个工厂中，主要工人是纺织女工，男工主要是钳工、车工等，从事的是机械修理和保障工作。黄金海是一名车工。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大多数是积极向上的。黄金海也受时代和环境影响，对于技术，下了一番功夫进行钻研。许多机械方面修理的活计，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工厂里的有些技术难题，也找他参与解决。那个时候，工厂里经常组织工人参加政治学习和其他政治活动，对此，黄金海也积极参加。讨论中，他的发言，还是有一点见解的，因此受到其

在“四人帮”上海党羽中，黄金海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本人是工人出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后来紧跟王洪文，当上了高官，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看家人”之一。粉碎“四人帮”后，他在上海参与搞武装叛乱，1982年被判刑。他的人生起伏，给人们以镜鉴。

他工人的另眼看待。

黄金海在国棉三十一厂有一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许多工人有困难，他主动帮助解决。自己能力不够，不能解决的，也要去安慰一下。工人中间难免有些小矛盾，他也出面调解。对于和他交往较多的人，他也以诚相待。这样一来二去，他在工人中也积累了一点小威信。黄金海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爱好，一有空，他喜欢看书。《毛泽东选集》在当年是很多人爱读的，他也不例外，自费买来，读了不少遍。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一套一套地准确背诵《毛主席语录》与他在这个时候的积累有关。但他身上也有许多要命的毛病，如：较为散漫，有时说话粗鲁等等，这是他当时没有被工厂党组织看好，没有成为工人中的党员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当年的黄金海，在国棉三十一厂是个表现也算好，但身上也有许多毛病的普通工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可能终生当一名普通工人，直到退休。

### 带头造反

黄金海在国棉三十一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关心政治。他毕竟读过几天书，有一定文化基础，平时爱看



书看报，也爱听收音机。因此，他对于国家大事是清楚的。

1965年，上海工业领导部门向国棉三十一厂派出了“四清”工作队，在该厂搞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在“四清”初期，工作队发动工人给厂领导提意见。黄金海是提意见较多的一个。从厂领导人的工作作风、生产管理、对工人福利的关心，到工厂领导人平时的吃穿住，他都提出许多意见。随从他提意见的工人也有一些。但是，黄金海本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他平时的一些缺点也让厂领导和其他一些工人抓住了，也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厂领导和“四清”工作组批评黄金海的许多意见，还是很尖锐的。一时间，黄金海自己觉得，在国棉三十一厂，有点颜面扫地，抬不起头来。这使他对厂领导和“四清”工作组产生了仇恨心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向关心中国政治动向的黄金海觉得政治风向变了，便带头开始造反。

当年夏季的一天，黄金海在工厂里贴出一张从政治方向到业务管理等多方面攻击厂党委和厂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同于此前他向工厂方面提的意见。一是这张大字报是从政治上全面批判厂领导人的；二是这张大字报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厂党委的；三是以大字报这种形式公开的。这在当时，是极少有人敢于这样做的。何况，大字报所提问题是十分尖锐的。“一石激起千层浪”。黄金海的大字报一贴出，工厂里的干部和工人即议论纷纷。有人说，黄金海是发疯了，敢于给厂党委贴大字报，这是反党，他不要命了。有人说，黄金海贴大字报，是对厂领导此前批评他的报复。也有一些人对他的的大字报采取支持态度。

第二天，反对他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但黄金海不示弱，接连贴出了几张反击的大字报。又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串连工作。这样，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工人。不久，黄金海和支持他的工人秘密酝酿，成立了国棉三十一厂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黄金海被推举为这个造反组织的头目。

但是，厂里也出现了另外一个较大的工人群众组织。这个组织较温和，对黄金海的过激行动和言论批评较多。厂党委和工作组也支持这个组织。黄金

海虽然有组织能力，但也架不住这个组织和厂内许多干部群众的“合力”。在自己的造反组织日益陷入困境时，他内心很是着急。

###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

就在黄金海内心焦急时，他得到了一个消息——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拉起了工人造反队伍，为首者叫王洪文，此人很有能力，在厂里呼风唤雨，不仅成为左右工厂“革命形势”的强大政治力量，还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与北京红卫兵也挂上了钩。黄金海想，何不去国棉十七厂一趟，与王洪文见一面，一来交流“造反经验”，二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一天，黄金海乘八路有轨电车，来到了国棉十七厂，打听到王洪文所在的办公室后，直接叩门进去，见到王洪文后，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摆出非常虚心的态度，说是要向王洪文“取经”。王洪文一听说是兄弟厂的造反派头目，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然后，滔滔不绝地向黄金海介绍了自己在工厂里拉起造反队伍的情况，还向他介绍了自己此前北京之行见到北京大学造反红卫兵组织头目的情况。黄金海虚心听着，不由得从内心里对王洪文肃然起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也向王洪文“控诉”了本厂“走资派”“压制工人阶级革命”的“滔天罪行”，也介绍了一些造反“经验”。二人越谈越投机，最后一叙年龄，二人竟然是同一年出生。这更加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从此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亲密战友”。

王洪文又介绍了他和国棉三十厂造反组织头目王秀珍串联的情况。二人



黄金海

马上去国棉三十厂见王秀珍。这样，黄金海由王洪文介绍，结识了王秀珍，此行真是收获不小。三人就在国棉三十厂共同商定，从今往后，三个工厂的三个造反组织，要相互支持，互相通气，共同与“走资派”和“保皇派”斗争。这就是后来王洪文自己得意地称之为“三点一线”发迹史，即：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厂、国棉三十一厂三个点，通过联接三厂的八路有轨电车相互串联。

黄金海结识王洪文、王秀珍后，在他们二人所拉起的造反组织支持下，把国棉三十一厂中与自己对立的造反组织压了下去，拉进了许多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他拉起的造反组织日益壮大，成为厂内最大的造反组织。

1966年11月6日，首都造反组织“红三司”和“炮司”驻上海“联络站”决定召开“上海工人串联交流会”，请一些工厂的造反组织头目去参加。结果王洪文和黄金海都参加了。

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和黄金海被推举为这个组织的核心组成员。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黄金海被正式推为“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当时进入“工总司”核心组的，除了王洪文、黄金海外，还有潘国平、叶昌明。连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岑麒麟都没有进入核心组。可以说，黄金海是名副其实的“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后来在王洪文搞的宣扬他造反“功绩”的材料中，黄金海在建立“工总司”中的作用，被重重写上一笔。

当时，进入“工总司”核心组的，都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头目中较有影响，较有组织才干者，黄金海能够进入核心组，自己觉得与其他核心组成员比，差一截，但有王洪文当司令，他的心里也算踏实一点。

### 大胆之举

黄金海进入“工总司”核心组，便不仅仅是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了，他也是全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多如牛毛，较大工厂的较大工人造反组织头目，都是有一定煽动和组织能力者，也都是胆子大，有一定头脑的人。黄金海居于他们之上，自己也觉

得要急于干出一点“名堂”来，否则难以服众。正好有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大显身手。

原来，参加“工总司”的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曾率先在厂里造反，并且拉起了一支造反队伍。但在厂里，反对他的人势力不小，厂党委也抓住他一些重大问题，将他打成反革命。确定他为反革命的材料，有一大叠，锁在厂档案室内。这是谢鹏飞的一块心病。谢鹏飞参加“工总司”后，就向核心组“控告”厂党委迫害他的罪行，然后单刀直入，提出要“工总司”帮助他到厂档案室中关于他是反革命的“黑材料”抢出来，销毁。王洪文一口答应了。在一旁的黄金海自报奋勇，说他要率领一些人去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办这件事。王洪文答应了。

说干就干。黄金海从自己手下的国棉三十一厂造反组织中挑选出几十个能闯敢干的工人，乘上他们抢来的厂里大卡车，带上谢鹏飞，直扑江湾。卡车一直开进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在谢鹏飞的指点下，卡车停到厂部档案室门口，几十人跳下卡车，在黄金海的指挥下，抡起手中大铁锤，砸开档案室的门，把谢鹏飞的档案材料全部抢走。

黄金海带着这批材料，回去向王洪文报功，得到了王洪文的夸奖。王洪文曾经将这次行动称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重大革命行动”（第一次是指王洪文亲自率人抢一些布店的红布做袖标——笔者注）。王洪文亲自下令，将谢鹏飞的反革命档案材料立即烧毁。

黄金海率人到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抢谢鹏飞的档案，是在1966年11月中旬。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展，虽然造反组织不少，但都知道档案室是机要重地，还极少有人敢于抢档案。黄金海此次行动，真可谓大胆之举，使他在“工总司”内得分不少。许多工人造反组织头目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有“革命魄力”，有胆有识，敢闯敢干。“司令”王洪文对他更加信任了。

### 王洪文手下“五虎将”之一

黄金海得到王洪文的信任后，便死心塌地跟随“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砸抢。当时，王洪文手下有五个能打敢拼，能够在打砸抢中率领一帮人冲冲杀杀的人。这五

个人是：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时人称之为王洪文手下“五虎将”。

11月9日，在“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时，黄金海率领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大会。会后，王洪文等煽动揪出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曹荻秋，冲击市委，黄金海即率领手下造反兄弟冲在前边。他高举造反大旗，走在队伍最前边，不时领头高呼“革命”口号。在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的情况下，王洪文煽动部分加入“工总司”的人到北京告状，黄金海也是冲在最前边的。无奈，就在他率领手下造反派冲击火车站时，他突然肚子巨痛难忍，浑身冒虚汗。他知道，自己的胃病犯了，只好向王洪文请假。王洪文批准他回去休息、吃药。这样，黄金海没有能够赶上冲击上海火车站事件。这使黄金海遗憾了很长时间。

王洪文率“工总司”部分造反派在安亭卧轨拦车时，黄金海听说了。他弯着腰，双手捂着疼痛的胃，到国棉三十一厂他的造反指挥部，写出控诉上海市委的材料，连夜指挥人刻钢版，印出三大摞传单，亲自率手下造反兄弟带着传单，跑到安亭火车站，增援王洪文，当场散发攻击上海市委的传单，为卧轨拦车的“工总司”造反派打气。他本人也不顾胃痛，加入到卧轨拦车的行列中。王洪文当着“工总司”造反兄弟的面称赞黄金海是“不怕死的革命英雄”。

安亭事件之后，黄金海挺着胃痛，跟随王洪文左右，指挥手下的人，按照王洪文指令，冲击市委，围攻市委领导人，被王洪文称赞为负伤也不下火线的“造反英雄”。

在王洪文等拉起“工总司”大旗的同时，上海也出现了另一个力量很强的群众组织——“赤卫队”。该组织与王洪文对立，提出了取消王洪文与张春桥在安亭事件后签订的“双五条”（“双五条”，即张春桥与王洪文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订的五条协议，主要内容是：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安亭事件责任由上海市委来负，今后对“工总司”的活动提供方便——笔者注）、打倒张春桥的口号，使张春桥很难受，王洪文的“工总司”也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王洪文



黄金海积极参与制造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三年后，张春桥、王洪文为纪念此事，拍摄了电影《一月风暴》。图为《一月风暴》中安亭事件的一个镜头。

决定踏平“赤卫队”。在围攻“赤卫队”中，黄金海是帮助王洪文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在王洪文指挥“工总司”抓陈丕显，并将其关进上海国棉十七厂时，黄金海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在王洪文指挥“工总司”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的时候，黄金海参与了谋划的全过程，并且在“斗争”中指挥手下人冲杀在前列。

黄金海在王洪文手下，率领他组织的造反队伍冲冲杀杀，很有一套。他在与对手“斗争”时，擅长一段一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并且总是用时兴的“革命道理”攻击对方，显得口才很好。他处事果断，下达命令简短有力，说一不二，在危险情况出现时，他表现得很冷静。在复杂情况出现时，他也能准确判断出利害得失，使他在攻击上海市委的“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各种政治势力较量中，从不吃亏，他手下的队伍也不断壮大。虽然他下达命令时，经常骂骂咧咧，带有不少旧上海时阿飞们常有的“脏字”，但仍然有不少造反派愿意跟随他冲冲杀杀，还称他为“黄司令”。而反对他的人则给他送了一个外号——“阿飞司令”。

黄金海虽然得到了“阿飞司令”的外号，但从总体上看，他表现得与粗鲁的陈阿大十分不同。他有头脑，有计谋，有预先的策划和组织，每次都能够在王洪文的意图办事，并且每次都能够在王洪文的意图办事，并且每次都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各路造反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能够独占鳌头，黄金海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因此，他深受王洪文信



任。即使后来王洪文因为陈阿大多次救了自己的命而对陈另眼相看时，仍然看重黄金海，并且把黄作为自己的亲信骨干。

1967年1月，上海搞一月夺权，建立所谓“上海人民公社”时，黄金海成为“上海人民公社”委员、常委。1967年2月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黄金海登上了主席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登上这样万人瞩目的主席台，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当上“大官”。在造反派控制的《文汇报》上发表的长篇新闻稿《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成立》上，写有这样的话：

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在这段话中提到的财权，当时就是由“上海人民公社”委员、常委黄金海掌握的。因为王洪文在张春桥支持下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时，黄金海是被派去夺财政贸易大权的指挥者，自然也就顺势掌握上海的财政贸易大权了。

### 扣押耿金章

黄金海在王洪文手下，是既有胆量，又有智谋的得力人物。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黄金海扣押耿金章这件事情上。扣押耿金章，为王洪文在造反派内部除掉不听自己话的异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耿金章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市产生的造反组织头目。他与王洪文比，资历一点儿也不差，也是中共党员，也是复员军人，也是干部，也是“工总司”的发起者之一。而且，耿金章有一定政治经验，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也受到过张春桥的信任，与张多次晤谈。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组织能力强，他担任“司令”的“工总司二兵团”的人数，占了“工总司”全部人员的一半。

早在“工总司”建立不久，耿金章就与王洪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张春桥虽然从中多次调解，却不见效果，二人分歧越来越大，直到耿金章率“二兵团”要与王洪文分庭抗礼时，王洪文才觉得事情严重。为了不让“工总司”分裂，王洪文对耿金章采取了一些让步态度，但却始终不信任耿金

章，耿金章也不服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耿金章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空头常委，手中没有任何实权，而且，在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根本不告诉耿金章。连“上海人民公社常委会”也不让耿金章参加。耿金章火了，决心与王洪文分道扬镳。

就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不久，耿金章就开始与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上海大联合委员会”串联，打算另外成立一个“第二上海人民公社”。耿金章此举，很快就被王洪文得知，张春桥自然也知道了。与“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这还了得！张春桥恼怒，王洪文发火。

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和王洪文商量，由他把二人叫到一起，先做一做耿金章的工作。但是，当张春桥把耿金章和王洪文叫到一起，让二人商量一下“工总司”内各兵团合并问题时，耿金章根本不买账。耿金章知道，王洪文已经得到张春桥的绝对信任，合并也好，“联合”也好，都是王洪文吃掉自己。他决不能放掉手中的实力。张春桥见做耿金章工作不成，即暗示王洪文可以对耿下手，除掉他。

除掉耿金章，并不容易。耿金章不仅手中有占“工总司”人员一半的“二兵团”，还与“一兵团”、“三兵团”保持联系，与反对张春桥、王洪文的上海一些造反组织串联在一起，势力极大。如果动耿金章，很可能引起上海全市武斗，被张春桥吹得天花乱坠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就“穿帮”了，“上海人民公社”也肯定会垮台。怎么办？王洪文脑子一转，立即想到足智多谋的黄金海。他把黄金海找到自己家来，二人关起门来密谋了一整天，一个扣押耿金章的方案形成了。

第二天，王洪文把耿金章请到“工总司”，对耿表现出无比的热情，和耿金章叙谈起造反的“革命友谊”，赞颂了耿的“革命精神”和“造反功绩”，还讲：“工总司”发展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走资派”，我们要认清主要斗争对象，“工总司”内部一定要团结。然后，话锋一转，提出，明天我们谈一下内部团结和联合的问题。耿金章见王洪文情真意切，就答应明天和王洪文一起谈一下。耿金章的打算是：通过这次谈话，摸一

下王洪文的底，在这个“工总司”“司令”面前，为“二兵团”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

耿金章毕竟有一定政治经验。对与王洪文交谈的地点十分在意。他知道，在王洪文势力范围内谈，自己将十分不利。他便问道：在什么地方谈？王洪文作思索状，说：在国棉三十一厂谈怎么样？耿金章想：国棉三十一厂，不是国棉十七厂，不是王洪文的老窝。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头目是黄金海，是黄控制的势力范围，而黄金海在“工总司”内，也和自己一样，是核心组成员。平时，黄金海对自己十分客气，十分尊重，没有做过任何不利于“二兵团”的事，在造反时，与自己也配合得很好。他认为，黄金海与自己，与王洪文，是等距离的关系。在国棉三十一厂谈，黄金海绝对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可以放心，便一口答应了。

隔日上午八点，耿金章率负责保护自己的手下几个亲随弟兄，分乘小轿车、越野车开到长阳路1382号国棉三十一厂门口。耿金章从车窗中看清：黄金海正满面笑容地在厂门口迎候自己，更加放心了。黄金海亲自指挥耿金章的车队开进厂里，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当耿金章的车队全部开进厂里时，黄金海下令：关上大门。他手下的弟兄立即将大门紧紧关死。耿金章仍然没有回过味儿来，以为是为了保密。便下了车，把手伸向迎过来的黄金海，想和他握手。没有想到，黄金海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变成了怒容，一把将耿金章伸过来的手抓住，对耿金章说：你今天来了，就走不了了。黄金海话音未落，埋伏在厂区内的黄金海手下造反队员们一下子涌出，将耿金章和他手下的人全部绑了起来。耿金章大喊：我是来和王司令谈大联合的事的！黄金海笑道：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你是反革命！耿金章知道上了当，当了俘虏，便大骂黄金海：“你是个阿飞司令！”黄金海回道：“你反对上海人民公社，你就是反革命！”他回头命令手下人，把他们拉到车上去！手下人七手八脚将耿金章等几个人推上事先预备好的大卡车，拉到杨树浦区公安局，戴上手铐，关进了监狱。耿金章这个常委，再也别想参加常委会了，与他手下的弟兄也失去了联系。黄金海把耿金章关了两个多月。在

此期间，他和王洪文一起，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把耿金章手下的“二兵团”全部“收编”到自己的造反队伍中。两个月之后，张春桥得知耿金章手下人已经被“收编”完毕时，假惺惺地找王洪文谈话，说耿金章在与“走资派”斗争中有功劳，在造市委的反时有贡献，要释放他，今后就把他当作新的“统战对象”。王洪文不敢不听张春桥的话，马上找到黄金海，在黄的陪同下，来到杨树浦监狱，笑容可掬地和耿金章谈话，说春桥同志十分关心你，要我们释放你，你出来后要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斗争。在监狱中受够了罪的耿金章对张春桥十分感激。他被放出来后，仍然担任“工总司”常委和“上海人民公社”常委。不过，他手下的人已经极少了，再也掀不起任何风浪了，更谈不上与王洪文抗衡了。黄金海为王洪文除掉了最大的敌手，王洪文对他更加器重了。

### 受到“四人帮”的重用

就在上海一月夺权不久的1967年2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指示》，指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革命委员会好”的话，随之，“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且于2月24日召开有百万人参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张春桥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成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金海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常委、革命委员会财贸组负责人。

当上上海军委会常委的黄金海，地位高了，身份变了，也坐上了轿车，住上了高干房。但仍亲自指挥武斗，曾亲自指挥手下除掉上海青浦县与“工总司”对立的一派。黄金海管上海市的财贸，有点儿“独特”。他对业务并不懂，但手下配几个懂业务的秘书。许多业务方面的事，都由秘书们拿出办法，写出材料，由他签字。他只问几个大的数字，好应对开会时别人的提问，或者应对上边的查问。他特别注意听张春桥、王洪文的指示，只要他们一发话，他立即执行。

他当上大官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上下班，还是到各单位检查工作，经常在自己的小汽车上，放一支小口径步枪。还预备许多子弹。一有空，就到靶场打上几枪。他这是和王洪

文学的。因为王洪文就经常自己带枪。黄金海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他知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打打杀杀，树敌不少，他预备的这支步枪，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涌现出许多的造反派头目，他们或者在派系斗争中被打压下去，或者受到重用之后不久，就不再受重用了。黄金海则不同，他一直受到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重用。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张春桥、王洪文十分效忠，对于他们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执行。

1968年下半年，王洪文亲自到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目的只有一个——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又是召开厂革命委员会核心组会议，又是在党员中串联，讲了黄金海一大堆“功绩”。他还提出了一个奇特的理由：黄金海已经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在王洪文的操纵下，黄金海在1968年下半年即入了党。后来，当上海市建立市委领导班子时，黄金海又成了市委常委，他分管财贸的官位没有动，还增加了一个头衔——市总工会常委。

党的九大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黄金海即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他唯“四人帮”之命是从。这样，他就一直受到“四人帮”的信任，不仅他在上海市的官位一直保持，还在“四人帮”的“力荐”下，差一点儿没有调到中央来当外贸部副部长。

据一位原国务院领导人回忆：1974年，他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时，住在锦江饭店，已经投靠“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的马天水前来拜访，实际上是奉“四人帮”之命，提出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当时“四人帮”已经在操作把他们在上海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官。这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即答复马天水：自己调中央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劝说这位国务院同志，直到深夜才走。这位国务院领导同志返京后即找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柴树藩商量此事。李、柴均认为，黄金海如真的塞进来，卡在他们中间，不好办。他们不同意。这样，黄金海没有调北京当外

贸部副部长。此事得罪了“四人帮”，也得罪了上海管财贸的黄金海。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

黄金海虽然没有当上外贸部副部长，但他在“四人帮”心目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粉碎“四人帮”后查出来的“四人帮”准备上台后的“组阁”名单中，黄金海赫然被列为“副总理”人选，并且在“四人帮”拟定的十三个“副总理”中，排名第八。

### 被刑16年

1976年10月，在黄金海的“副总理”梦没有圆，却得到了“四人帮”在北京被抓的消息。他焦急，他紧张，他愤怒。他知道自己也是“四人帮”的人，与“四人帮”有荣辱与共的关系。因此，他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孤注一掷，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中去。

1976年10月，黄金海在焦虑中度过。他参与了策划、组织了向上海工人人民兵突击发武器和准备武装叛乱的重要活动。从9日到12日，他每天按约定时间去总工会和王秀珍、徐景贤等人碰头。特别是10月12日下午，他和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他的老窝——上海国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还策划制定了叛乱用的21条标语。同日晚，他和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萧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秘密会议，进一步提出停产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叛乱方案。

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果断而又策略的行动，粉碎了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顺利向上海派出了中央工作组，控制了上海。黄金海的好日子结束了。不久，黄金海被隔离审查。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其中，黄金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中，戴立清是个重要人物。他出身临时工，靠造反起家，投靠王洪文。

“四人帮”形成后，他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党羽。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受“四人帮”的安排，在上海主管科技工作。他迫害知识分子，有一套独特手法。粉碎“四人帮”后，他参与策划叛乱，最终获刑。

## “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

之六

# 戴立清

■霞飞

### 上海标准材料厂的临时工

戴立清原籍本不是上海，而是山东省郯城县人。1938年，戴立清就出生在该县，后来随父母迁居上海。同当时移民上海的许多劳动人民一样，戴家靠做工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家境不好，戴立清并没有受到过良好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他读了几天书，也不多，但他也不算文盲，是能够读书看报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大力搞建设。在那个年代，中国用工量急增，戴立清也被招到上海标准材料厂当工人。不过，他不是正式工，而是临时工。当年的临时工，付出的劳动不比正式工少，甚至还要多一些，但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不如正式工，这使戴立清感到不平等。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原因之一。

与那些业余时间只知道打牌、喝酒的临时工不同，戴立清平时爱看报纸，也读《毛泽东选集》。他很注意了解国家大事，了解政治情况，在该厂包括临时工和正式工在内的工人中，应该说，戴立清是有一定头脑的。他平时和工友相处，也很随和，有人遇到困难，他也愿意帮一把，因此，他在上海标准材料厂工人中的“人缘”算是很好的。

### 当上了“总司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早

已经对自己和其他临时工待遇不满的戴立清，开始串连一些工人造反。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工人还是不敢参加造反活动的，但是，戴立清胆子大，有一种天地不怕的劲头。他自己率先给标准材料厂厂长和党委书记贴出大字报，还串连、鼓动其他工人给厂长和厂党委书记贴大字报。

当年，上海标准材料厂的工人写的大字报中，有的光讲工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受到的歧视，有的只是讲厂领导高高在上，不关心工人，有的则只是写上时兴的标语。戴立清写的大字报，与众不同。他在大字报中，既举出实例讲本厂工人、特别是临时工的实际处境，更联系当时的政治，使用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政治词汇，引用他在《毛泽东选集》里看到的一些话。而且，他联系政治，引用语录，都较有条理，一层层深入，显得有理有据。这样，他的大字报所起的煽动作用就更大。一些造反的工人看了他贴出的大字报，便主动找他联系。这样，在戴立清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参加造反的工人。

在戴立清身边聚集的造反工人中，以临时工为主。这些临时工，平时看到自己劳动强度大，待遇却与正式工相比差得很远，有一肚子的情绪，在戴立清

的鼓动下，他们的情绪更大了，并且“上升”到与“走资派”斗争的“高度”。戴立清拉起的造反组织后来在上海标准材料厂所以能够称雄一时，与这些临时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戴立清觉得，自己要造反，不能光是依靠临时工，还要与正式工建立联系。在这方面，他下了一番工夫。他主动接近一些造反的正式工，和他们讲临时工的困难，讲工人造反要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道理”。一开始，这些正式工看不起戴立清这个临时工，有的人甚至认为，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正式工的事，与你们临时工无关，你们干好活就是了，何必参与？但戴立清是能言善辩的人，他巧舌如簧，往往是几番说服，就使一些正式工对他另眼相看，愿意跟着他造反。这样，在戴立清的周围，又聚集了一批正式工。

戴立清比较有组织能力，他觉得，光是自己干，肯定不行，一定要组织起一个造反队伍。他对自己在厂里搞什么样的造反队伍，组织结构怎样，什么人 是骨干，搞什么活动，提出什么样的口



号等等，都进行了仔细盘算，之后即找几个和他联系紧密的人共同酝酿。经过一番活动，以戴立清为首的上海标准材料厂工人造反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即建立起来了。

上海标准材料厂中，也有其他一些工人造反组织，戴立清对这些组织，又拉又打，不是吞并，就是压下去，最终，他为首的工人造反组织，成了该厂最大的组织。

戴立清觉得，光是自己厂里的工人造反组织单独活动，力量还是太小，也容易被其他更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吃掉，于是，他开始到同行业或者相近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中串连。那时，他下班后，连衣服也来不及换，常常带着一身油污，出现在其他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面前。他说话并不只有政治口号，而是较为平实。他把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的共同利益，讲得很透彻，对工人造反组织面临的问题，今后的行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因此，这些工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对他也很佩服。他很快就在这些工人造反组织中树立起了个人威信。到1966年底，戴立清已经串连起其他厂的许多工人造反组织，并与这些造反组织头目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更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戴立清和一些跟着他造反的骨干商议后，给这个组织取名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戴立清被推举为“总司令”。

#### 投靠王洪文

1966年11月5日，王洪文等一些工人造反组织头头，在有中央文革小组背景下的“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上海工人串连经验交流会”，6日，建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是上海较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王洪文等人酝酿建立该组织时，戴立清没有得到消息，因此，他没有参加这个工人造反组织的筹备和建立活动，自然也没有被选为“工总司”的头目。但是，戴立清很快就知道了“工总司”，也了解到了“工总司”的活动情况和影响。特别是“工总司”在建立不久即搞的几次大的活动，对他震动很大。他想，“工总司”敢于在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敢于向上

海市委“叫板”，并且和中央文革派来的张春桥直接对话，和他们签订了五条协议，真是了不起。他萌生了带“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参加“工总司”的念头。此时，王洪文也想进一步串连上海工人组织，壮大自己搞的“工总司”，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走到了一起。1967年初的一天，二人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了。戴立清和王洪文一见面，就很谈得来。戴立清很佩服王洪文的组织能力和“胆识”，而王洪文也对戴立清的组织、煽动能力高看一眼。在与王洪文见面后，戴立清立即找“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骨干商议，最后大家都同意并入“工总司”。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入“工总司”后，经王洪文提名，戴立清成了“工总司”的核心组成员，后来，核心组成员改称“常委”，戴立清也就成了“工总司”常委，他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上海巨鹿路691号“工总司”总部，并开始参与指挥“工总司”的一个又一个“造反行动”。

#### 成为王洪文的“五虎将”之一

戴立清投靠王洪文后，唯王洪文之命是从。王洪文命令他打砸哪个机关，他立即带人前往。王洪文让他去串连某个造反组织，他立即带上随从，前去做说服工作。王洪文让他打压某个工人组织，他立即带领造反队伍前往，又拉又打，直到完成王洪文交给的任务。

戴立清做了许多让王洪文满意的事。这里只说两件：

一件是砸《解放日报》。1966年12月，王洪文带着几百名“工总司”队员，与《解放日报》内的造反派里应外合，加上《文汇报》内的造反派组织“铁骨红心”兵团的配合，要夺《解放日报》的权。他们的行动受到当时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赤卫队”的反对。王洪文急了，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专门要砸《解放日报》。戴立清即被王洪文确定为“火线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戴立清“上任”后，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具体调兵遣将，组织“工总司”队员占领了《解放日报》大楼，该报被迫停刊。“赤卫队”也不示弱，他们动员了上海百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的口号，将占领《解放日报》的“工总司”队员全部包围在《解放日报》大楼内。在这个重要时刻，戴立清组织占领《解放日报》的“工总司”队员，把守住《解放日报》大楼的各个门口，不让“赤卫队”的人冲进来，还调动数万上海市“工总司”队员和许多支持“工总司”的人，在上海各大路口与“赤卫队”对峙。双方剑拔弩张，一场血战即将发生。此事惊动了中央，陶铸亲自打电话制止未果，在张春桥的阴谋活动下，上海市委作了让步。这件事对上海市震动极大，影响不下于安亭事件。这件事也被王洪文视为他称霸上海的重要一步，是他十分辉煌的一页，而戴立清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洪文自然赏识他。

一件是砸“联司”。1967年，上海出现了一个与“工总司”对立的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这一组织一开始是从“工总司”中分化出去的，拉走了不少原“工总司”的人，又联合其他群众组织，因此发展迅速，人数不久就与“工总司”持平，而且在上海还出现了许多支持“联司”的联络站，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支联总站”。更主要的是：“联司”不光支持一个“炮打”张春桥的组织——“红革会”，还直接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并且派人闯进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家里。张春桥愤恨之余，使出了以工人组织对付工人组织的毒计，示意王洪文派“工总司”的队员抓了“联司”的人，之后，“联司”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洪文和“工总司”。1967年7月，王洪文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踏平”“联司”的计划，代号为“888计划”。执行这个计划的现场总指挥是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戴立清是王洪文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是具体执行“踏平”“联司”的“前线总司令”。后来，王洪文干脆设立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一线总指挥，仍然是戴立清。他不仅指挥第一线攻击队伍的行动，还奉王洪文之命，指挥各区、部、局“工总司”队伍的机动调配。在指挥此次行动中，戴立清先是用计策，利用“上体司”（上海体育系统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的胡永年（人



称“胡司令”),在一个深夜,把正在开会的“支联站”头目抓了起来,使各个“支联站”和“支联总站”群龙无首,使“联司”孤立。8月4日,戴立清在王洪文的部署下,具体调动24万“工总司”队员,包围了“联司”老窝上海柴油机厂。在戴立清的指挥下,这些“工总司”队员手拿钢管、弹弓、木棍、砖头,向拒守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队员发起攻击,在气温高达39度的环境下,数十万工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最终,“工总司”将“联司”“踏平”,活捉了“联司”头头杨仲池。

戴立清帮助王洪文灭了“联司”,上海再没有能够与“工总司”抗衡的群众组织了,“工总司”成了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王洪文正是以此为“资本”而称霸上海的。戴立清在“踏平”“联司”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王洪文当然对他极为赏识。

戴立清在帮助王洪文灭掉一个又一个对立面的过程中,点子多,能想出一套一套的办法,而且不择手段,甚至使用旧上海黑社会才用的手段,因此,当年上海群众给他送了一个外号——戴溜子。王洪文对戴立清很满意,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超过了对国棉十七厂和自己共同造反“哥们”的信任。从此,戴立清成了王洪文的左膀右臂,时人称他和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为王洪文的“五虎将”。

#### 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一月夺权”后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由于毛泽东主席不同意用“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并且认为用革命委员会名称为好,“上海人民公社”旋即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酝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时,王洪文极力推举戴立清。这样,戴立清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戴立清之所以能够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固然与王洪文的极力推荐有关,但也是当时许多因素所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戴立清以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功绩”而名声超过许多同期的造反派头目。他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他拉起的造反队伍也比较

大,在跨行业串连这方面,他并不比王洪文逊色多少。他在组织能力方面也不比王洪文差,有一帮小兄弟聚集在他周围,形成了他固有的一种势力。第二个因素,戴立清有代表性,他是以临时工的身份造反的。当年,不光是在上海,在全国,临时工也是很多的。临时工的处境不如正式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起来时,许多临时工有趁此机会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的想法。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行动的。在上海,这种临时工参与造反的人也很多。张春桥在考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时,自然要考虑这个因素。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张春桥当然知道,把戴立清拉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来说,有很大好处,至少可以通过戴立清,拉拢众多临时工。第三个因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实际领导人,又有毛泽东夫人特殊身份的江青,曾对临时工有特别的“关心”。她在一次接见临时工造反团体时,竟然流着眼泪说:我要代表全国的临时工,向“走资派”进行“声讨”。在组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戴立清这个临时工造反派头目,自然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操纵下产生的。除了以上三个因素外,不能不讲到戴立清的个人

因素。戴立清这个人,虽然只是一个临时工,但他有一定政治头脑,脑筋反应也相当灵活,他看问题不同于其他一些工人之处是:每件事情,他都能从大的政治方面考虑,采取自己的行动。他的性格也不是狂躁、激烈的,不是一味地打打杀杀。他做任何事,都事先反复考虑利弊得失,想到多个方案,经过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为人的性格,是比较沉稳的,遇事比较冷静。同时,他也有从他祖辈身上遗传下来的山东人豪爽的一面,为人处事,有一点敢出头、讲义气的性格。这也是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能够看上他的重要原因。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考虑分工时,别人看不上科技这个范围,没有人愿意去管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进入常委的人中,都愿意管工业,管外贸,管财政税务,管交通等等,因为这些行业中,有许多造反弟兄在支撑着他们,也有相当大的权利。而科技战线中,造反的人也有,但与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共同语言少,不好联系;科技战线上知识分子多,复杂,不好管。因此,谁都不愿意接这个摊子。连原来在“工总司”中任“科技组”负责人的叶昌明也不愿意管科技工作。但戴立清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上海市的科技战线在全国有影响;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内部矛盾多,反而好分化,好管理。在上海管科技,大有前



1967年1月,上海市建立“上海人民公社”。



途。因此，当分工时，有人提出让他管科技时，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王洪文让他同时分管专案工作，他也同意了。从此，戴立清手中就有了很大权利，但管科技，一直是他的主要权利范围。

本来，戴立清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科技战线出来的人；他的造反“班底”在上海标准材料厂；他在科技战线没有“基础”；他没有科技方面的“铁哥们”而且他本人对科技一窍不通，也没有做过科技方面的工作。按理说，他最不适合管科技。但是，戴立清却大胆地接受了管科技的工作，且看他他是怎么样管上海科技的。

### 迫害上海知识分子的“科技领导人”

戴立清一上任，就把上海科技界各单位的领导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他在会上说现在，市革命委员会分工我管科技，今后你们就要听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服从我的领导，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革命委员会的，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你们要是听我的话，服从我的领导，一切有我。有成绩，大家都有，首先是你们的，出了问题，由我担着，你们不要怕。戴立清这些话还真能吸引许多人。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戴立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一种义气在，由他管科技，我们有了靠山，至少不为做事情而前怕狼后怕虎。

但是，戴立清实际上并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做。他管科技，很重要的一个“成绩”，是迫害科技人员，迫害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文化不高的人，戴立清在内心世界里，与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面对有很高文化修养和科技专长的上海科技界知识分子，他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处处无理由地贬低知识分子。他还经常列举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大肆嘲讽。另一方面，戴立清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必须接受自己的领导和改造，他一向认定，自己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来管理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他虽然不是对知识分子非打即骂，甚至在某些场合还要做一些对知识分子比较客气的表面文

章，但他内心深处，是以“改造知识分子”为“己任”的。

正是出于上述观念，戴立清管科技时，就没有停止过迫害知识分子。戴立清迫害上海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是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进行的。

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968年，中国有过一段“清理阶级队伍”的经历，而“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内容，是挖出“敌特”。当时的戴立清，既分管科技，又是全上海市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他要是在上海科技战线搞出一点专案工作的名堂来。戴立清认为，上海科技界敌特众多，会挖出一大串。那个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挖科技界的敌特上面。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他有功绩，另一方面，他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使别人不敢反对他。因此，1968年，戴立清在上海科技系统做“清理阶级队伍”动员报告时恶狠狠地说：上海科技界“敌情十分严重”，概括起来是有“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他声称，对上海科技界，必须深挖，坚决把一切反革命挖出来。他不仅这样讲，还亲自领导“深挖”。那个时候，在上海科技界，凡是留洋回来的，都被他列为深挖对象，立案侦讯。许多大学教授，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动不动就被叫到戴立清在康平路设立的审查室接受审查，凡是被叫去的，大多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人，有的人立即被关押起来，有的人没有被关押，也被扣上许多帽子，接受长期审查。个别没有被扣上帽子的人，也是被训斥一顿，闹得灰心丧气。许多大学教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被戴立清扣上了“特务”、“间谍”的帽子，受到长达十多年的迫害。特别是在外国留学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免受磨难。因为这些人在外国都有许多同学、朋友，在过去的的时间里有过通信联系。这些通信，一旦被戴立清发现，就是“罪证”，因为他能从字里行间“发现”（实际上是他的无端胡猜——笔者注）出许多“问题”来，一发现“问题”，就肯定会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在此情况下，许多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害怕被扣上帽子，预先把一些和外国同学的

通信烧掉，其中包括一些探讨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凡是被扣上“特务”、“间谍”帽子的人，想解释，戴立清根本不听。有许多知识分子含冤自杀。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我国著名有机化学专家，在世界有关学术界也享有很高威望，他富有爱国心，为报效祖国而努力工作，却被戴立清扣上“特嫌”的帽子，对他多次批斗，长期审查。多亏汪教授是个心胸宽广之人，否则早就被戴立清折磨死了。活下来的汪教授后来在科技战线取得了重大成就，1984年被法国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学院院士。

上海708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为反对张春桥，被戴立清抓起来，关了五年，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文革”中也险些被迫害致死。戴立清曾亲自带领造反派去彭加木住处抄家。许多彭加木的科研资料被戴立清等拉走，后全部被毁，是我国科研工作的重大损失。

### 被“安排”入党

戴立清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临时工，表现也不是很突出，即使在各级党组织重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年代，他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戴立清对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戴立清造反起家，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情况不同了，入党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关系到他今后能否戴稳自己已经到手的乌纱帽。他也为入党的事动了心思。1968年底，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党的九大。张春桥预料，九大之后，中央将稳定局势，各地的权力机构将重组。在此时，必须拉进一些“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人入党，以便在今后组建各地权力机构时，让那些极左的人掌握各级领导权。张春桥也特别关心上海。他特别关照王洪文，注意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入党之事。王洪文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对跟着他打打杀杀的小兄弟的入党之事十分卖力。当年，在戴立清入党问题上，张春桥和王洪文想到了一起，也配合得很好。张、王二人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内部早就串连起“安排”戴立清入党之事。“安排”



入党，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拉“特殊人物”入党整个过程的概括用语，很恰当地体现了事情的实质。这种“安排”，是使用权力的运作，是避开正当程序的强制。戴立清正是被“安排”入党的。

1968年底，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操纵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安排”戴立清入党，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上海标准材料厂。这些工作组成员，全都是王洪文亲自选定的。他们执行王洪文的指令不折不扣，在行动方式上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使出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贯采用的上纲上线，用大帽子压人的本领。他们一进厂，就造出舆论说：我们就是为戴立清入党的事来的，谁反对戴立清入党，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压制新生力量。这些工作组成员找标准材料厂的党员们谈话，一个一个做工作，不断地给他们念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

上海标准材料厂内的党员中，许多人反对戴立清入党。一开始，同意他入党的人不到三分之一。但工作组的工作没有白做，经他们串连，有一部分反对戴立清入党的人勉强同意了。即使如此，同意戴立清入党的人还不到一半。中央召开九大的一天一天临近，张春桥、王洪文着急了，接连不断地催促。然而同意戴立清入党的人数始终无法突破一半。没办法，张春桥、王洪文商议后决定：把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直接报给标准材料厂的上级党委。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立即被专人送到某机关党委，而某机关党委事先也得到了张春桥、王洪文的授意：一定要让戴立清顺利入党。在此情况下，某机关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这样写道：“根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

尽管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上这样的话而实现入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绝后，但戴立清毕竟入党了。戴立清一点也不顾虑入党志愿书上怎么写，只要入党就行。他清楚，有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照，自己入了党，不仅能保住现有权力和地位，还会继续上升。他想对了。果然，在他入党不久，就被任命为

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实权的角色，掌握着大笔资金和物资的使用权力，并且许多工作与军事有关。

革命委员会常委戴立清，不仅管科技，又管后方基地建设，他的权利范围扩大了。

#### 受到审判

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形成的“四人帮”在中央掌握大权，在各地也务色紧跟他们的人作为他们的爪牙。戴立清早就受到张春桥的信任，又是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被“四人帮”列为在上海的“班底”，而戴立清自己也清楚：自己是靠着张春桥、王洪文才上来的，没有张春桥、王洪文等，也就没有他自己今天的地位。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四人帮”的命运连在一起，如果张、王等人倒了，自己也就倒了。因此，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部押在了“四人帮”上。他在上海卖力地宣传“四人帮”的观点和主张。“四人帮”在中央搞什么名堂，他和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们立即紧跟，在上海掀起一个一个声浪，配合“四人帮”在中央的活动。他指望，“四人帮”能够掌握中央大权，自己的地位会再度升高。

但是，戴立清的打算落空了。1976年10月6日，中央在北京不费一枪一弹抓捕了“四人帮”。

中央刚刚抓捕王、张、江、姚时，他们在上海的党羽对北京的情况不明瞭，未敢轻举妄动。不久，“四人帮”在



受审时的戴立清。

北京的党羽刘庆棠通过暗示，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知道中央“出事了”。徐景贤等人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在策划武装叛乱的过程中，戴立清又一次成了“急先锋”。10月9日凌晨，在徐景贤、王秀珍的安排下，戴立清等王洪文的“五虎将”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酝酿武装叛乱。戴立清在会上说：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我们的功绩的。接下来，戴立清和“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一起，着手组织上海民兵队伍、向民兵发放武器等行动。

对于他们的行动，中央早有预料。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7日将马天水调到北京后，又于10月10日将徐景贤、王秀珍调到北京。这样，就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在此后的10月12日夜间，作为王洪文手下“五虎将”之一的戴立清，又在上海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们一起研究制订了名为“捍一”和“方二”的武装叛乱计划，试图用停电、停水、发标语、印“起义”传单等办法，“立即起事”，搞“第二次造反”，但因为没有任何总头目拍板，没有付诸实行。

10月13日、14日，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先后在上海高层和基层传达，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上街游行，庆贺这一伟大胜利，连戴立清等人费心组织的民兵也加入到庆贺行列，“四人帮”上海党羽的武装叛乱计划彻底破产。10月24日，上海市在人民广场召开百万军民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戴立清等人原来计划调动的上海民兵几乎全部参加了此次大会。戴立清彻底绝望了。不久，他被隔离审查。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其中，戴立清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霞 飞

## 之七：叶昌明

##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

叶昌明原籍上海嘉定县，他的父亲靠做工维持家庭生活。叶昌明1944年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上海虽然仍然在日本人手里，但上海周边地区的人民抗日斗争已经广泛发展起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战中以灵活机动的方式予日军以沉重打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在人民群众中威信非常高。共产党在上海市的地下党组织也十分活跃。叶昌明的父亲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劳动者，他仇恨日本人的统治，思想上是进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由国民党统治，但人民群众没有享受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接收大员大肆贪污受贿，物价不断上涨。特别是在1947年后，国民党军事失败，经济崩溃，上海的物价上涨更快，上海市人民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叶昌明的父亲与当时绝大多数上海工人一样，走在了游行队伍中。1949年上海解放，叶昌明的父亲又走在上海工人欢迎解放军的队伍中，他由衷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新中国建立后，他一家过上了能够吃饱穿暖的日子。共产党特别重视依靠工人阶级。当年，在上海当一名工人，十分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政治上翻了身的叶昌明的父亲以努力工作来报答共产党的恩情。环境和家庭不能不对叶昌明产生影响。他从小就知道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从心里来说，他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初，叶昌明

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又上了中学。60年代初期，叶昌明被分配到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当化验工。就他的工作性质来说，介于工人与非工人之间。说他是工人，他也不是在生产第一线劳动的产业工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他也不算。后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叶昌明把自己划入了工人队伍。这也是张春桥、王洪文让他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分管全上海市工会工作的重要原因。

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有一批研究人员、工程师。这些人是研究所的骨干。他们知识丰富，在本专业领域有很高造诣，叶昌明在研究所只是一个化验工，但却总是高看自己，工作中总是爱提出自己的一套。现在看，这也没有什么，只要提的对，也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但叶昌明毕竟学识有限，提的意见不被采纳，这使叶昌明感到失落。叶昌明工作后，还是比较努力的。但他有一个特点：平时对自己要求不算严格，却总是爱盯着别人的缺点，也爱给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他在领导和同事中，威信都不算高。由于这个原因，叶昌明长期心情不舒畅，他认为自己根红苗正，工作也行，总是得不到重用。

当年的叶昌明，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总体上看，他还是好好工作的小子。当年，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建立了一些小组。叶昌明所在的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平心而论，叶昌明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也为该小组做出了他的一份贡献。他有一些思想问

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人，都熟悉叶昌明这个名字。他曾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特别是在上海这个工人集中的地方，叶昌明可是一个显赫人物。但是，曾几何时，他又从云端跌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题也可以理解。但是，“文化大革命”却把他的这些思想问题推上了另外一个方向，成为他走上另外一条路的重要因素。

## “工总司”发起人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长期不满自己处境的叶昌明开始造反。

这一年，叶昌明刚刚22岁，正是敢闯敢干的年龄。他率先给厂领导贴出大字报，并且在研究所内部进行串连，要拉起造反队伍。很快就有一些人参加到叶昌明的造反队伍中来。有这么多人参加一个22岁的小伙子组织的造反队伍，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别看叶昌明年纪小，却能说会道，又打着革命的旗号，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很能迷惑人，因此，他能够说服一些人跟自己造反。第二，叶昌明敢干。他的“勇气”，使一些人愿意跟他干，因为如果出了事，有叶昌明顶着，他们不过是随从。第三，叶昌明有一定组织能力。他能够按照参加自己造反队伍的人的特点，安排他们做适当的事，这使一些人愿意跟他走。第四，当时的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内，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不被信任，而工人家庭出身、地位不高的叶昌明则属于“红五类”。该研究所的职工们在“文





化大革命”初期是愿意推举一个“红五类”打头阵的。

但是，叶昌明在拉起造反队伍时，也受到了抵制。不仅研究所领导批评他，进驻该研究所的工作组也批评他，使叶昌明感到了压力。但叶昌明没有放弃，仍然在工人中搞串连。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叶昌明的造反队伍也逐步扩大。

在叶昌明拉起的造反队伍不断扩大时，上海各工厂兴起了跨单位、跨行业串连之风。当时，上海市委是不准许各工厂工人组织跨单位、跨行业串连的。市委向各工厂派出的工作组也把禁止跨单位、跨行业串连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这一禁令很快就被各工厂工人造反组织突破了。当年，王洪文到北京串连回到上海后，即着手跨单位、跨行业串连。与此同时，叶昌明也开始了在上海搞跨单位、跨行业串连。即使如此，叶昌明与王洪仍然互不认识。但历史的机缘决定，他们两个人必然走到一起。根据是：他们两个人都在寻找支持自己的其他造反组织。

叶昌明结识王洪文，还要从“首都红三司”在上海的活动说起。“首都红三司”是有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组织，他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到全国各地串连，试图把造反行动引到全国。该组织到上海后，曾经要搞倒上海市委，结果没有搞倒。他们想到，要串连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和他们一起搞，才会有力量。于是，他们到各工厂、单位去，专门串连那些在造反初期受到上海市委工作组批评的人，期望能和他们联手造市委的反。而在当时，叶昌明正是受到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领导和市委工作组批评的人，他便顺理成章地被“首都红三司”选为串连对象。11月5日，“首都红三司”在被他们占领的上海愚园路一所老式房子里召集一些工人造反组织头目开会，叶昌明就是被召来开会的人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叶昌明和其他一些工人造反组织头目一起，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共同商量了串连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方式。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到，一定要找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来开会。提议者还提到了王洪文的造反经历和去北京串连的经历。22岁的叶昌明听到这些后，对王洪文就很有敬佩之心。1966年11月

6日，叶昌明再次来到上海愚园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此次他是来参加“上海工人串连经验交流会”的。王洪文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次会上，叶昌明和王洪文一见如故。在会上，王洪文讲了建立全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的设想，他用略带东北口音的标准普通话沉稳表达自己的意见，叶昌明对王洪文很是佩服。在这次会上，叶昌明极力推举王洪文当他们刚刚酝酿成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总司令”。在这次会议上，叶昌明也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由于他来自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与会造反派们认为叶昌明是科技方面的代表，便在会上让这个22岁的常委分管科技。其实，叶昌明根本不懂科技。不久，他就把管科技这件事让给了戴立清。

在当年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叶昌明的年龄最小，只有22岁。22岁，就有着“不寻常”的造反经历，有着一定组织能力和号召力，这也使王洪文对叶昌明高看一眼，在此后的许多重大行动中，王洪文都重用叶昌明，表现出对他的充分信任。

从这次会议的过程和叶昌明在会上所起的作用，以及他被选为“工总司”常委来看，叶昌明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没有错的。后来，叶昌明也在“工总司”中起着重要领导作用。

1966年11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叶昌明上台发言。他在发言中控诉上海市委的“罪行”时，把他所在的曾被树立了先进典型的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作小组，说成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假典型”、“黑标兵”。这次发言，是叶昌明在几万人参加的大会上的第一次露面。他的发言也给人以深刻印象。有人说他敢于造反，有人则说他没有良心。

#### 几件大事的参与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总司”干了几件大事。这几件大事，叶昌明都参与了，并且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一件事是制造安亭事件。1966年11月，在上海市委不同意“工总司”关于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等无理要求时，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工总司”的头目一起商量后，决定去北京告状。当

他们的行动受到上海铁路方面的阻止时，他们在华东地区和内地的交通枢纽——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在卧轨拦车时，叶昌明和王洪文“并肩作战”，他们率先躺在冰冷的铁轨上，前边就是冒着黑烟的火车头，如果火车一开动就会把他们压得粉身碎骨。在此情况下，二十多岁的叶昌明却没有任何胆怯。他的行动，带动了其他人，许多“工总司”队员见“总司令”王洪文、常委叶昌明都不怕死，便纷纷效仿，一起躺在铁轨上。这样一来，安亭车站被堵，交通中断，直接影响到华东地区，进而影响到全国。中央震动，不得不派人解决。在解决过程中，张春桥耍弄两面三刀手法，与“工总司”签订了“五条协议”，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安亭事件由市委负责。从此以后，“工总司”横行上海，队伍和影响也扩大了。在安亭事件中，叶昌明敢于打头阵，立了功，王洪文对他十分赏识。

一件事是夺《解放日报》的权。1966年12月1日，王洪文率一部分“工总司”队员来到《解放日报》社，以支持“红革会”为名，联合《解放日报》内部的造反派，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在夺权时，叶昌明紧跟在王洪文左右，是“火线指挥部”指挥之一，向《解放日报》领导人发出勒令的是他，联络《解放日报》内部造反派的也是他。夺《解放日报》的权，像一个导火索，引爆了上海其他造反组织。当时支持上海市委正常办报的“赤卫队”联合其他造反组织，把已经占领《解放日报》“工总司”队员包围在《解放日报》社内。在此情况下，叶昌明在《解放日报》社内不断给“工总司”队员打气，要他们坚持到底。为了反击“赤卫队”关于支持市委正常办报、要让市民看到《解放日报》的“四点意见”，叶昌明于12月1日参与起草了与赤卫队针锋相对的“四项要求”：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叶昌明参与起草的这“四项要求”，得到王洪文批准后，作为传单在全上海散发，后来成了“工总



司”向上海市委施压的基本条件。《解放日报》事件震动全上海，也惊动了中央，最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王洪文得手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代表在上下两方面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2月10日，主持上海市委常务工作的曹荻秋签署了中共上海市委沪委（66）第12号文件，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承认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工总司”借此次事件，又进一步夺了《文汇报》的权，从此在上海称霸。在此次事件中，叶昌明在实际行动中步步紧跟王洪文，既“展现”了他的文字工夫（参与起草“四项要求”），又表现出他的勇敢（率人占领《解放日报》大楼），并且与包围《解放日报》的“赤卫队”对垒。王洪文对叶昌明更高看一眼了。正是通过此次事件，“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被叶昌明“比”了下去。虽然潘国平仍然是“副司令”，叶昌明仍然是常委，但叶昌明在“工总司”中的实际地位，已经是实际的“副司令”了。

一件事是总攻“赤卫队”。“赤卫队”是上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的群众组织，规模与“工总司”不相上下。该组织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工总司”对立。1966年12月27日，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聚集在上海市委办公地点康平路，要求市委取消对“工总司”的承认，而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28日，集中在康平路的“赤卫队”队员人数增至三万。在张春桥的挑动、造谣下，“工总司”决定在康平路对“赤卫队”主力发起总攻，消灭其主力。叶昌明摩拳擦掌，主动请缨，担任了攻击“赤卫队”主力打头阵的任务。28日当天，叶昌明在几个小时内即调动十多万“工总司”队员，将在康平路的“赤卫队”三万多名队员团团包围于康平路，断粮断水。一直将这三万多人困了三天。到30日凌晨，王洪文下令对被围在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发起总攻击。叶昌明一马当先，率领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冲杀在前，一个个赤卫队员在他们的棍棒打击下倒地，旋即被捆。叶昌明率人一直冲进“赤卫队”阵地的核心，将“赤卫队”的头脑人物捆起来。这一

下，“赤卫队”失去了指挥者，顿时乱作一团。叶昌明指挥“工总司”队员把康平路的“赤卫队”队员分割包围，全部缴械。除一万多人跑掉外，所剩近两万人全部被俘。到此，“赤卫队”主力全部被歼。

叶昌明在康平路消灭“赤卫队”主力中立了头功，更加受到王洪文的器重。

在揪陈丕显，游斗陈丕显和曹荻秋的过程中，叶昌明也是组织者之一，从安排游斗车辆，到撰写游斗口号，都有叶昌明的心血。

在“一月夺权”中，叶昌明起了王洪文左膀右臂的作用。特别是在串连38家造反组织过程中，叶昌明每天在各造反组织头目中穿梭，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与“工总司”共同行动。1967年1月，上海38家造反组织共同建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这个总站的建立，如同姚文元当年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在张春桥的操纵下，在这个联络总站的基础上，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庆祝大会，宣告：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饱含着叶昌明的“心血”，在组建“公社”班子时，自然有他的份。叶昌明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常委”。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叶昌明成为革命委员会常委。

#### “刁德一”外号的由来

叶昌明有一个外号——“刁德一”。刁德一本是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伪军胡传魁部的参谋长。剧中人物以阴险狡诈的面目留给观众很深的印象。而上海老百姓送给叶昌明“刁德一”的外号，是有来历的。别看叶昌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龄不大，却很有城府，政治手腕很不一样。在与其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建立的造反组织头目的谈判中，叶昌明总是先敲山震虎，摸清对方的“底牌”，然后软硬兼施，压迫对方妥协，与“工总司”“联合”。叶昌明靠这一套手法，给“工总司”拉进了许多工人造反组织，使“工总司”不断扩大。这是王洪文最高兴的。

叶昌明对与“工总司”对立的工人

造反组织则采取另一套手法。他先是派人摸清该造反组织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对其头目的情况，要了解得十分清楚。他在与这些造反组织头目的谈判中，用他掌握的他们的某些缺点，威胁他们屈服。如果他们不屈服，他就采用造舆论的方式，将他们搞臭。这样，这个工人造反组织也就土崩瓦解了。

叶昌明平时的行为，也是他获得“刁德一”外号的重要因素。叶昌明心眼活络，脑子一动，就能想出一个点子，他平时眼睛乱转，在众多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能在短时间内将一些重要人物的脸色、表情掌握清楚。这给人一个印象——叶昌明狡猾、阴险。而叶昌明在对待对手时，心狠手辣。他采取将对手关押、诋毁其名誉、对其动刑等多种手段整治对手，直到将其整服。不服的人，也被其搞得名声扫地，再也立不起“山头”了。

叶昌明既阴险狡诈，又手段狠毒，是他获得“刁德一”外号的根本原因。

#### “文革”中上海工会的“管家”

叶昌明与王洪文的关系，真的可以用“铁哥们”来称呼。王洪文对叶昌明十分赏识，对他十分信任。时人称叶昌明和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一起，为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

王洪文本人当过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靠造反起家。在“文革”初期，他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左右上海局势，王洪文也自称是工人代表。当党的九大之后全国各地重新建立党委，造反组织逐渐淡出时，“工总司”即隐藏于上海市总工会中，实际上，上海市总工会成了“工总司”的翻版。当时的上海人都知道：“工总司”即总工会，总工会即“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大小权力全部由“工总司”大小头目掌握。因此，王洪文十分重视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他说过这样的话：“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王洪文经过考虑，决定派叶昌明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主持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当时，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由王洪文兼任，副主席有王秀珍、陈阿大、金祖敏等掌握上海市实权的市党政重要领导人（王秀珍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是上海市组织和人事全权主管、陈阿大管上海的工业和交



通)，而叶昌明则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可见他的地位有多么重要。实际上他是上海工会系统的“管家”。当时，叶昌明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却给了他三个职务：一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二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三是在上海市委建立后当上海市委“列席常委”。这样，叶昌明就有了两个正式职务和一个特殊职务。两个正式职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特殊职务是：上海市委“列席常委”。这三个职务，非同小可，这决定了叶昌明不仅是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之一、参与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上海总工会的真正“一把手”，主持上海市总工会的日常工作，手中有很大权力。

叶昌明当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时，市总工会的干部要由他任命，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全上海市的干部任命方面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在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支持下，当时，叶昌明在上海一言九鼎。1974年，叶昌明在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与叶昌明一唱一和，立即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在叶昌明的安排下，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党政领导职务。更有甚者，上海市几次向党中央和国务院输送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是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的。

叶昌明担任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一职，非同一般。叶昌明不是通常只是在常委会上听一听、提一些参考意见那种“列席”，而是在市委常委会上说话极有分量甚至带有决定意义的“列席”，市委凡是作出重大决定，叶昌明的意见都带有重要决定作用。他这个“列席常委”，在市委常委会上，地位比正式常委还重要。因此，在叶昌明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实际上是上海市第二权力机构。当时就有人说：别看叶昌明不是市委副书记，权力却比市委副书记还要大。

### 热衷政治舆论

叶昌明不同于其他“四人帮”上海党羽的特点之一，是他特别注重政治宣传，热衷于抓舆论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工总司”即办《工人造反报》，发行量最高时达105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量。

《工人造反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不仅被当时上海各单位视为政治学习文件，有的还经张春桥、姚文元推荐，在《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上转载。当时全国各地造反组织特别是工人造反组织都重视阅读《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借此了解中央文革的意图。党的九大后，中央不再允许各造反组织自己办报刊。全国各地造反组织也烟消云散，没有人再办报刊了。唯一的例外是：原来上海“工总司”办的《工人造反报》仍然继续出版发行，只不过改由上海市总工会办了，但仍然有“造反”字样。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此有看法。张春桥怕因此引火烧身，让王洪文停办。王洪文向叶昌明转达张春桥指示，叶昌明却找各种借口拖着，直到1971年4月，在下有反映、上有批示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停办。但他马上又以上海市总工会的名义办起了《简报增刊》、《批林批孔动态》、《内参》等等。虽然叶昌明将它们称为“内部刊物”，但他尽量扩大发行面，至少发到各省市区领导干部。叶昌明试图用这种方式影响全国的高级干部，影响全国政治。1975年，已经不受毛泽东信任的王洪文回上海，要求上海市总工会办刊物。叶昌明手中办刊物的力量是现成的，立即采用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与市总工会宣教组合办的名义布置办两个刊物《工人理论》、《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两个刊物均以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的名义出版。《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1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发行。不料，被中央看到后要求停办。这样，《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没有再出第2期。《工人理论》也没能办起来。对此，叶昌明心中十分窝火，找王洪文提意见，又给张春桥写信提意见。

尽管如此，叶昌明在当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期间毕竟办了许多年刊物，先是宣传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精神，后来是宣传“四人帮”的极“左”观点，在全国造成了很坏影响。

### 曲折的入党经历

叶昌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根本不够入党条件，他自己也认为入党是一个奢望。现在，他当官了，成了上海市的“大员”，如果还是“党外人士”，无论从对外观感方面考虑，还是从他行使权力考虑，都很不自然，叶昌明也就有了入党的“迫切愿望”。其实，王洪文早就考虑到自己小兄弟的前途问题了，早就为叶昌明入党问题“操心”了。张春桥在叶昌明入党问题上也十分积极，他还说着这样的官话：我们党要吸收一大批优秀工人进来，特别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先进分子”，一定要尽快吸收他们入党。

在叶昌明入党问题上，王洪文具体操作的最多。本来，王洪文是想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把他手下的“五虎将”和其他一些跟他造反的造反派头目都拉进党内来的，他趁毛泽东发表“吐故纳新”指示的“东风”，在那前后迅速把陈阿大、戴立清、马振龙、黄金海等拉入党内，但在拉叶昌明入党时，却遇到了麻烦。

原来，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子有关。虽然这桩人命案子已经时间很长了，一直没有搞清楚，但在查案子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叶昌明也是这桩人命案子的参与者之一。“文化大革命”中，此事也就压下不提了。但当王洪文拉叶昌明入党时，此事又有人提了出来。并且说：这毕竟是一桩人命案子，一定要查清。如果和叶昌明没有关系，他当然可以入党；如果一旦查出叶昌明和这桩人命案子有关，那么，发展他入党，不就成了大错误？

王洪文一听，也没有话说了。这样，叶昌明入党的事就拖了下来。九大之前，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中，四个人都已经解决了入党问题，陈阿大还当上了九大代表，出席了九大，而唯有叶昌明没有解决入党问题，还是“党外人士”，叶昌明心中很急，王洪文、张春桥的心中也很急。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事件。“四人帮”在中央的地位上升，而中央也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此时，张春桥想到了要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上海的“基地”问题。而巩固上海“基地”，很重要的内容是巩固他们在上海的党羽的地位，扩大他们的权力。为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立即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



题。张春桥找王洪文专门谈这件事。王洪文提到：就是有人拿什么人命案做文章，不好办。张春桥说：不好办也要办，你去办。

为解决叶昌明入党的问题，王洪文冥思苦想，他忽然想到了马天水。马天水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经投靠了张春桥，与王洪文成为一伙。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马天水是作为老干部代表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任副主任，后来地位在王洪文之上，又有能干、能抓经济之名，在上海颇能迷惑一些老干部。九大后成立上海市委时，马天水是市委副书记，地位十分重要，上海许多党组织中的老干部，还听他的话。王洪文想到此，立即找到马天水，把叶昌明入党遇到难题的事说了。马天水说，这件事我来办吧。于是，马天水直接给叶昌明所在单位党组织打电话，询问叶昌明入党的事。当叶昌明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说有人命案子时，马天水火了，带着怒气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这桩人命案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查清楚了，现在也很难说能够查清楚。难道说这桩人命案子永远查不清，叶昌明就永远不能入党吗？接着，马天水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不听你们的解释，你们一定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你们要知道，解决不解决叶昌明入党的问题，不是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你们想想吧。叶昌明所在单位党组织受到了来自王洪文的压力，又受到了上海市老干部代表的压力，不得不勉强解决叶昌明入党问题。但他们在叶昌明的入党志愿书中“党委审批意见”一栏中写道：“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这样，叶昌明入党的问题，在拖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973年解决了。此后，他的“列席常委”分量就更重了。更重要的是，他赶上了在党召开十大之前解决了入党问题，能够进入新一轮班子组成和权力分配了。

#### 垂死挣扎那几天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当时，叶昌明虽然对北京的情况不太清楚，但在内心有一点“第六感觉”。

早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的1976年9月21日，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他暗中会见了他的小兄弟们，其中包括叶昌

明。王洪文此行的实际目的，是组织上海民兵，突击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并且对民兵布防进行安排。叶昌明忠实地执行着王洪文的指示。由于上海民兵是以工人为主的，而工会则是当时组织上海工人的一个主要手段，因此，叶昌明在他管辖的上海工会系统进行安排，是组织上海民兵“备战”的重要环节。那几天，叶昌明可忙坏了，他到各单位检查工人民兵武器发放问题，检查民兵布防情况。特别是对关系上海交通要道、重要设施、重要单位的民兵布防，他检查得十分仔细。敏感的叶昌明隐约感到，中央可能要出大事。可以说，他对于中央出事，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

当有人从北京暗示王、张、江、姚在北京被控制时，叶昌明的神经还是受到了刺激。他又是惊恐，又是焦虑，又是愤怒。

10月9日，王秀珍在上海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召开会议，策划搞武装叛乱时，叶昌明显得非常激动。他眼睛里喷着火，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但是，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中央要求已经被控制在北的马天水给在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说他在北京一切都好，“四位首长”（指“四人帮”）也都很好，身体很好，工作很忙。王秀珍立即将这一情况转告叶昌明等王洪文的小兄弟。叶昌明信以为真，松了一口气说：虚惊一场。

但叶昌明毕竟是心眼很多的人。他对于马天水从中央传来的消息还是有一点疑惑。当马天水从北京传来消息，让徐景贤和王秀珍去北京开会时，叶昌明专门找徐、王二人说：你们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意思是说：如果中央真的发生了把王、张、江、姚抓起来的事，他们立即在上海起事。

当叶昌明等人从特殊渠道得知“四人帮”已经被抓的确切消息时，他又开始积极行动起来。10月12日晚间，叶昌明等十几个人在康平路开会，策划叛乱问题。当夜，他们策划了“捍一”和“方二”武装叛乱计划。之后，叶昌明和这些人一起乘轿车驶往位于上海外滩的上海市总工会大楼400室，研究了停水、停电、罢工等“起事”方案。之

后，叶昌明还决定，由工会系统向下“吹风”，策动当年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工总司”队员们起来，搞第二次造反。叶昌明还决定，如果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13日不回上海，他们就要在13日晚上“起义”。

在叶昌明的调动下，13日凌晨1点，原“工总司”的各造反队的头目都集中到上海市总工会大楼。叶昌明向他们宣布，现在召开紧急会议。接下来，他讲了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在面临着大考验……

叶昌明讲完，开始对“起义”进行具体布置。就在此时，从北京传来消息，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将于13日上午飞回上海。有人主张，再等几个小时，看他们三人回来后带来什么消息。

叶昌明等人等待的这几个小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已经对上海“四人帮”党羽的动静了如指掌，并且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同时，中央向上海派出了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后，也不得不向“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文件。不久，中共中央解决“四人帮”的消息在全国公开，上海市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被孤立。他们策划武装叛乱的计划彻底破产。

不久，叶昌明被隔离审查。被隔离审查时，刚刚三十多岁的叶昌明抵触情绪很大。后来，叶昌明对一些问题还是有所认识，曾在被隔离审查期间的1977年写出了《交待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等材料。但是他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毕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许多罪行，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进行公开审理，作出判决。其中，叶昌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